

绿色国内生产总值 研究框架的方法论研究

杨缅昆 张玉哲

摘要:任何研究框架都有其方法论的基础。笔者认为,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框架作为现行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框架的一种变革,是近十几年来提出的一种新的研究框架,它同样具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概念结构和核算结构。对于这一框架提出的成败得失,有必要从方法论角度加以剖析,从而科学进行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是一个包括经济学、核算学和环境学在内的跨学科的研究框架,其理论和方法十分复杂。

关键词:研究框架 理论基础 概念结构 核算结构

方法论是任何学科框架赖以建立的基础。一般而言,方法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方法论是指一门学科的技术步骤,或者说是指一门学科的具体方法。广义的方法论则不同,它是指“对论证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①。当我们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研究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DP)框架时,所采用的是广义的方法论的概念。

一、研究框架

科学研究框架(以下简称研究框架或框架,英文为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术语,也是运用方法论来评价某一学科首先遇到的问题。这一术语是由科学哲学研究权威拉卡多斯(Lakatos, I.)提出来的。从定义上看,所谓的研究框架是指“由一个共同的硬核(hard core)派生出来的一组相互联系的理论”^②,换句话说,它体现着包括概念结构、基本假定以及主要原理在内的一组理论的总体特征。当一种新的研究框架产生后,我们是接受抑或拒绝这一框架,关键在于与传统的研究框架相比较,这一框架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为此,拉卡多斯提出一个判断标准:如果某个研究框架能够解释所有与之对抗的框架所预言的事实,并且还做了进一步的预言,那么这个研究框架就是进步的,就会优于其他的研究框架。^③

众所周知,绿色 GDP 框架作为现行 GDP 框架的一种变革,是近十几年来提出的一种新的研究框架。对于这一框架提出的成败得失,有必要从方法论角度加以剖析。“硬核”反映着研究框架的核心思想,代表着研究框架的发展方向,集中地体现研究框架的设计目的。因此,只有对“硬核”的内涵做出正确的规定,才不至于使绿色 GDP 框架的研究失去方向。

笔者认为,绿色 GDP 研究框架的“硬核”应该体现着这样一种思想:由于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过度利用,引发了环境系统对经济系统生产的经济福利的负面效应,^④因而,现行 GDP 的外在数值并不是其内含的真实福利效用的体现,前者可能远大于后者。因此,以现行 GDP 指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准,将会扭曲地反映本应代表福利规模增长的经济增长状况。所以有必要在现行 GDP 研究框架的基础之上,纳入资源因素和环境因素,并在经济、资源和环境三者之间寻找出共同分析的基础,通过对现行 GDP 的调整,使其内含的经济福利规模外在化,从而为正确度量经济规模及其增长速度提供科学的标准。

从历史上看,在如何构造绿色 GDP 研究框架的问题上,或者说,在如何构造研究框架“硬核”的问题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思想。一种思想认为,应以生态系统为中心构造绿色 GDP 研究框架;另一种思想认为,应以经济系统为中心构造绿色 GDP 研究框架。两种思想的支持者为自己理想中的研究框架争论达数十年之久。尽管联合国统计局出版的 1993 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将绿色 GDP 框架作为现行 GDP 框架的附属框架,采纳了后一种以经济系统为中心构造绿色 GDP 框架的思想,使有关绿色 GDP 框架“硬核”问题的争论,暂告一个段落。但这并不意味着前一种思想必定是错误的。只是说明,坚持以生态系统为中心作为绿色 GDP 框架的“硬核”的专家们,在目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很难构造出一个既有新的功能又能保持传统 GDP 的旧的功能的研究框架。

可是,在国内理论界,许多学者并没有真正理解联合国统计局关于绿色 GDP 框架的构造思路,相反

他们极力主张用绿色 GDP 来取代现行 GDP,这种观点貌似正确但实际上是很不现实的。

根据前面我们对绿色 GDP 框架的“硬核”的阐述,可以知道,现行 GDP 和绿色 GDP 是两个既有联系更有区别的指标范畴。前者反映的是一定的生产规模,其功能在于开展宏观经济分析;后者则说明一定的福利规模,其作用旨在科学地衡量经济增长,并对资源环境恶化的现象有所监控。倘若以绿色 GDP 取代现行 GDP,使后者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宏观经济分析就成为无源之水,失去了用以分析的指标基础。例如,从核算技术角度看,由于环境退化这一外部性因素并不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增加值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而仅仅是从总体上影响现行 GDP,这就客观决定了绿色 GDP 不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增加值之和。于是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任何基础数据来开展产业结构的分析。又如,与现行 GDP 特点不同,绿色 GDP 不是国民经济部门间生产技术联系的集中反映,或者说彼此之间不存在一定的线性经济技术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投入产出分析就失去基础,没有了用武之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显而易见,以上述观念构造绿色 GDP 框架,尽管能将研究范围由经济系统延伸至环境资源系统,弥补了现行 GDP 框架的不足之处,但却由于它将绿色 GDP 与现行 GDP 割裂开来,以前者完全取代后者,使国民核算框架失去了宏观调控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经济分析功能。所以,根据拉卡多斯关于研究框架成败的判断标准,我们与其说这一绿色 GDP 框架是进步的,还不如说它是退步的。

在研究绿色 GDP 框架过程中,还有一种错误的观点影响着研究的进程。这种观点是建立在“污染可以提高 GDP 的数值”的错误假定基础之上。许多学者从这一假定出发,通过推论和演绎,认为保留或消除现行 GDP 内部因污染所引发的“重复计算”因素,是区别现行 GDP 和绿色 GDP 两个指标范畴的关键所在,并主张绿色 GDP 不应包括环境保护费用。这种观点之所以错误,是由于在理论上它将现行 GDP 与绿色 GDP 之间的差异仅仅理解为因统计方法的“重复计算”而导致的量的差异;而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由于环境退化等外部性损害因素的影响,使现行 GDP 所包含的福利数量和福利质量(效用)出现质的差异;在方法上则将环保活动的微观核算指标范畴(环保费用),在没有根据宏观核算的要求做出任何处理的情况下,直接作为讨论绿色 GDP 核算的基本依据,犯了方法上的错误。^⑤

目前,国际上出现多种绿色 GDP 研究框架,其中以联合国统计局颁布的经济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Environmantly adjusted net Domestic Product, EDP)研究框架最具有权威性。然而,由于绿色 GDP 核算是一个包括经济学、核算学和环境学在内的跨学科的研究框架,理论和方法十分复杂,因此这一框

架从方法论角度看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仍有许多理论和方法问题有待我们研究解决。

二、理论基础

任何研究框架,都不是由单一理论而是由相互联系的一簇理论支持的,绿色 GDP 研究框架同样也是如此。首先,这一研究框架表现为一个统计方法理论体系,或者说,它是集几百年来人类创造的统计方法技术之大成的核算理论。与以揭示客观对象的本质特征为宗旨的抽象理论不同,这种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更侧重于如何利用现有的统计方法,或通过创造新的统计方法,来更好地描述和分析所要研究的客观对象;其次,由于这一研究框架是旨在构建能够为宏观决策服务的方法体系,因此,这种核算理论的建立又必须以一定的经济理论为前提,受一定的经济理论所支配。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经济理论,尤其是劳动价值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曾为构建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the 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 MPS)研究框架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甚至在我国核算体系由 MPS 转轨为 SNA 的今天,这些经济理论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不存在过时失效的问题。然而,马克思经济理论毕竟是以研究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目的的抽象理论,该理论所舍象的在当时被视为次要的而在当代社会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却没有得到 MPS 研究框架的设计者们的重视,从而没有给予应有的还原。基于这一原因,MPS 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描述国民经济运行和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方面,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局限。

SNA 在创立时期,正值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尤其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在西方各国盛行之际,并成为各国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学说。SNA 的主要贡献者理查德·斯通教授,巧妙地将宏观经济理论中的收入均衡公式揉和进 SNA 研究框架内,使其四大基本账户即生产账户、消费账户、投资账户和国外账户及其内部指标项目,与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中的概念范畴和基本原理遥相呼应,使传统单一的国民收入估算变革为以反映社会产品及其价值运动过程为主要特征的核算体系,从而在各国宏观调控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以后 SNA 框架的内容日益丰富,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但迄今为止,以凯恩斯经济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的特征仍旧没有消失。

绿色 GDP 研究框架,从本质上说,是环境经济核算一体化的研究框架。具体地说,它是在单纯以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的传统 SNA 框架基础之上,通过容纳资源、环境两大因素,并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的一种研究框架。所以,相对于传统的 SNA 框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众所周知,无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还是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它们都是单纯以经济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

没有或较少涉及环境现象和资源现象,因此,尽管这两大经济理论在绿色 GDP 框架中仍旧没有失去原有的价值,但却无法在传统的 SNA 框架转化为绿色 GDP 框架过程中,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即我们应该寻求什么经济理论来支持绿色 GDP 研究框架。

国内理论界的一种流行观点是,应该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绿色 GDP 研究框架的理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观点并没有什么错误。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目前可持续发展只是一个概念,一种思想或一个原则,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换句话说,它只告诉我们“应该”将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绿色 GDP 研究框架;但却没有提供在传统 SNA 框架基础上,“如何”容纳环境与资源因素,使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的理论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仅靠可持续发展思想来构造绿色 GDP 研究框架是远远不够的。

笔者认为,从构造绿色 GDP 框架角度看,著名经济学家 A. C. 庇古创立的福利经济学说,尤其是其中的外部性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庇古在其学说中所提出的某些概念,已无法准确说明当代社会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些概念范畴重新定义,赋予新的内容,就不难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庇古在当时将国民收入定义为经济福利,但这恰恰是当代人们批评现行 GDP 的根本原因。不过,如果我们将 GDP 定义为名义国民福利,将绿色 GDP 定义为实际国民福利,那么庇古留给我们的难题将会迎刃而解。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说,尤其是其中的外部性理论之所以能够作为构造绿色 GDP 框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因为:第一,由于绿色 GDP 指标从本质上讲是反映福利总量而不是生产总量的综合性指标,^⑥因此,绿色 GDP 框架的研究对象与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第二,经济外部性理论是以市场经济为立足点,研究游离于市场经济外的因素如何对其发生影响;而绿色 GDP 研究框架则以反映市场活动的传统 SNA 框架为基点,通过考察环境资源等外部性因素的影响,以使作为名义福利指标的 GDP 转化为作为实际福利指标的绿色 GDP,可见,在研究内容上,绿色 GDP 框架与经济外部性理论是不谋而合的;第三,根据经济外部性理论,一种活动是外部性活动抑或内部性活动,其衡量标准是宏观成本与微观成本是否存有差异。这就为我们构建与现行 GDP 核算相区别的绿色 GDP 核算的研究框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核算原则。

三、概念结构

概念结构是人们根据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而做出的主观规定,它是由众多概念范畴组成的一个有

机整体。概念结构不仅是理论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理论结构得以构建和展开的逻辑起点。

与任何研究框架相同,绿色 GDP 框架也内含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结构,其中既有反映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定的基本范畴,也有与基本范畴相联系的辅助范畴。在绿色 GDP 研究过程中所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概念范畴中,联合国统计局公布的 EDP 框架内的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两大范畴最令人们关注和瞩目。这是因为这两大范畴不仅在理论上揭示了经济系统与环境、资源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众多概念范畴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而且从方法上看,这两个概念范畴也可直接转化为指标范畴,成为现行 GDP 转化为绿色 GDP 的重要中介变量。所以,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分析和比较这两个概念范畴或指标范畴。

根据 EDP 核算思路,虽然从表面上看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现象,但就本质而言,彼此都是一样的,都是经济活动对环境系统的一种消耗,尽管资源消耗表现为有形消耗,而环境退化表现为无形消耗。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人们将两者都视为经济活动的环境成本,甚至将其都看做是经济活动的生产成本(中间消耗)。以这一理论认识为前提的结论是,从现行 GDP 转化为绿色 GDP 的过程,就是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这两个因素的核算及其被扣除的过程。

笔者虽然举双手赞成这两个范畴的提出,也认为这两个范畴是绿色 GDP 核算概念结构中最基本的范畴,但对如何认定它们的性质却持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两个范畴所反映的研究对象虽有共同之处,但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就共同之处而言,相对于经济系统,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都属于外部性因素。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这两种现象之所以作为外部性因素,是因为它们都会导致宏观成本和微观成本的差异,从而导致宏观收益和微观收益的差异,符合庇古在经济外部性理论提出的判断标准;从核算意义上看,传统的 SNA 框架从本质上说是对市场体系活动规模的描述和反映。然而资源耗减也好,环境退化也好,它们都没有经过市场体系,这就导致两者对经济活动发生的影响,无法在传统 SNA 框架中得到体现。应该指出的是,资源耗减与环境退化虽有共同的地方,即它们都对经济系统产生外部影响作用,但所发挥的影响效应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考察资源耗减概念。笔者认为,在绿色 GDP 框架中,相对于经济系统,资源耗减并不是一种环境成本,而是一种环境收益。对于这一看法,可能有许多学者不赞成。他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资源耗减,顾名思义,是对资源的损耗,既然如此,它又如何成为环境收益呢?显然,要理解这个问题必

须从绿色 GDP 本身的性质入手。如前所述,绿色 GDP 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福利指标,反映着一定时期的福利规模,倘若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相对于绿色 GDP,凡是导致国民福利价值增加的外部效应,就应视其为外部性收益,并成为绿色 GDP 的组成内容;反之,凡是导致国民福利价值减少的外部效应,才应被视为外部性成本,不属于绿色 GDP 核算的对象。正如美国著名环境经济学家 A. M. 弗里曼指出:“在福利经济学中,一条基本原理是:所有成本最终都以人们福利效用减少的形式表现出来。”^⑦

显然,以这一认识为前提,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将资源耗减视为环境收益。因为,虽然资源耗减意味着自然资源总量的减少,但在环境经济核算一体化的前提下,既然我们认同没有经过人类劳动“滤过”的自然资源也应具有自身固有的内在价值,因而也需按照市场规则对其进行估价;那么,资源耗减价值从环境系统中游离出来,并没有自行消失,相反,它转入经济系统,与劳动价值一道,成为体现于商品内的福利价值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传统的社会产品核算没有包括这部分价值,而绿色 GDP 核算必须考虑这部分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资源耗减不应视为环境成本,而应视为环境收益,即环境系统无偿向经济系统提供自然资源的一种“收益”。

其次,考察环境退化概念。如前所述,人们将环境退化称作环境成本。如果从通俗描述的角度看问题,这种提法未尝不可。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将环境退化定义为环境成本,是含糊不清的,其后果容易导致绿色 GDP 研究步入歧途。例如,由于受这一定义的影响,许多学者主张将与环境有关的费用,不分性质如何,也不论是“外部的”环境成本,还是“内部的”环境成本,一律纳入环境退化核算的内容。错误地将实际环境保护费用作为绿色 GDP 核算的扣除因素,就是这种观念的典型表现。可见,将环境退化视为环境成本既不确切也不科学,而应该根据经济外部性理论,将其定义为外部性损害(或外部性成本),尽管对经济系统来说,外部性损害的内容不仅包括环境退化因素。

如何在理论上认识环境退化对本期经济活动规模即 GDP 的影响,是我们正确构造绿色 GDP 研究框架的前提之一。笔者认为,从福利角度来考察,如果环境质量良好,社会产品表现为福利数量与福利质量的统一,那么,现行 GDP 可视为实际国民福利而不是名义国民福利;然而,一旦发生环境退化,社会产品的外在的福利数量与内在的福利质量便会发生偏离。具体地说,环境退化作为外部性损害因素,虽然不会对社会产品中的福利数量产生任何有形的影响效应,即作为反映社会产品规模的 GDP 并不会因环境恶化的程度高低在数量上发生变化;但是却会对社会产品内含的福利质量或效用产生无形的抑制

作用。这样,从宏观上看,只要存在环境退化因素,国民福利质量的规模不仅决定于国民福利数量的规模,而且受制于环境退化等外部性损害因素,这样必然导致国民福利质量的增长在数值上落后于国民福利数量的增长。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以福利数量为计算依据的 GDP 仅仅表现为名义国民福利,也就是说,由于环境退化等外部性损害因素的影响,现行 GDP 的外在数值并不是其内含福利质量或效用的真实体现。而两者之间的差异,恰恰是环境退化这一外部性损害因素作用的结果。可见将环境退化这一现象进行货币化估算,并从 GDP 中予以扣除,目的在于,使经过调整后的绿色 GDP 指标的外在数值与其内含的福利质量或效用相吻合。这就是笔者对环境退化之所以作为绿色 GDP 核算的扣减因素的理论阐释。^⑧

四、核算结构

根据对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两个范畴的理论认识,笔者曾撰文指出联合国统计局公布的 EDP 核算公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其不足之处。^⑨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修正和改造。下面我们分别从生产法和使用法构造新的绿色 GDP 或 EDP 核算公式,为了使公式简便易懂,我们将固定资产折旧和进出口等因素存而不论。

(一)按生产法计算的绿色 GDP 或 EDP

$$GDP = Q - M \dots\dots\dots (1)$$

$$GDP_1 = Q - M + S = GDP + S \dots\dots (2)$$

$$GDP_2 = Q - C_1 + S - E = GDP_1 - E \dots\dots\dots (3)$$

式中,Q 和 M 分别代表社会总产出和社会中间产品价值;GDP₁ 和 GDP₂ 分别代表经过价格因素调整的 GDP 和经过价格、环境两因素共同调整后的 GDP,GDP₂ 也可称之为绿色 GDP 或 EDP;S 和 E 分别代表资源耗减价值和环境退化恢复成本,后者又称环境质量恢复成本。

(二)按使用法计算的绿色 GDP 或 EDP

$$GDP = C_1 + I_1 \dots\dots\dots (4)$$

$$GDP_1 = C_1 + I_1 + S = (C_1 + S \times C_1 / Y) + (I_1 + S \times I_1 / Y) = C'_2 + I'_2 \dots\dots\dots (5)$$

$$GDP_2 = C'_2 + I'_2 - E \dots\dots\dots (6)$$

式中,C₁ 和 I₁ 分别代表现行 SNA 的消费产品和资本净形成;C'₂ 和 I'₂ 分别代表经过价格调整后的消费产品和资本净形成;Y 代表 GDP。

在解读以上公式时,有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从现行 GDP 转化为绿色 GDP 或 EDP 过程中,必须经过两个步骤,一个是价格因素调整,另一个是环境因素调整;

第二,价格因素调整的意义在于,传统的 GDP 作为社会最终产品的价值体现,是以市场价格为计价标准的。在对环境经济进行统一核算的情况下,

仅以市场价格表现的社会最终产品价格是不完整的,因而有必要将游离于市场体系外的资源耗减价值追加其内。

第三,环境退化的经济测算,应采用环境质量恢复成本概念,而不应采用实际环境保护成本概念或者环境退化损失成本概念。^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笔者将公式的理论阐释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之上:如果环境质量恢复到良好水平,经过价格环境因素调整过的 GDP 即绿色 GDP,其外在数值将与其内含的福利效用在数值上保持一致;或者说,经过价格环境因素调整后,将会使原内含于名义福利指标 GDP 的福利价值外在化。

第四,从理论上说,如果能针对每一种类的产品自身的情况而追加相应的资源耗减价值或资源价格,是最好不过的了,然而在核算实践中这一做法面临种种困难和障碍,且核算成本极高,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只能将资源耗减作为经济系统的统一的外部性因素来处理。

第五,世界银行 20 世纪 90 年代所发表的国民财富研究报告,已将国民财富范围由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扩展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如果这一理念能够被核算界接受,那么资源耗减价值的承接体不仅是投资产品,而且还包括消费产品;或者说,资源耗减价值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分配。但由于受目前我国统计技术水平的限制,在当前我们应采用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以消费产品和投资产品在 GDP 中的比重为标准进行分配。

注释:

①②③[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前言,287,42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④环境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环境概念还包括自然资源。在本文各处所使用的环境概念可从上下文的联系中理解其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

⑤杨缅昆:《绿色 GDP 和环保活动核算》,载《统计研究》,2000(5)。

⑥杨缅昆:《绿色 GDP 核算理论问题初探》,载《统计研究》,2001(1)。

⑦[美]A. M. 弗里曼:《环境与资源价值评估》,中文版,47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⑧杨缅昆:《国民福利核算的理论构造——再论绿色 GDP 核算理论思路》,载《统计研究》,2003(1)。

⑨杨缅昆:《关于 EDP 核算思路的若干质疑》,载《统计研究》,2002(3)。

⑩杨缅昆:《环境退化:核算理论和方法》,载《统计研究》,2004(11)。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中文版,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2. 姚志勇:《环境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3. 潘家华:《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4.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5. A. M. 弗里曼:《环境与资源价值评估》,中文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6. 高敏雪:《环境统计与环境经济核算》,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7. 杨缅昆:《绿色 GDP 与环保活动核算》,载《统计研究》,2000(9)。

8. 杨缅昆:《绿色 GDP 核算理论问题初探》,载《统计研究》,2001(1)。

9. 杨缅昆:《关于 EDP 核算思路的若干质疑》,载《统计研究》,2002(3)。

10. 杨缅昆:《国民福利核算的理论构造——再论绿色 GDP 核算理论思路》,载《统计研究》,2003(1)。

11. 杨缅昆:《EDP 核算理论问题的再探讨》,载《统计研究》,2003(12)。

12. 杨缅昆:《环境退化:核算理论与方法》,载《统计研究》,2004(11)。

(作者单位:仰恩大学 泉州 362000
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N)

(上接第 25 页)的产权界定,其交易费用比物质产品的产权界定更大,因而对它进行权益保护的难度也更大。权益保护难和交易费用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产品的又一个产权特征。依据传媒产品的商品属性及其产权特征,发展传媒经济必须在制度创新上肯下功夫。传媒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因此,有必要突破国有资本一统传媒业的格局,就是说,传媒业必须走市场化、产业化和集团化的道路,需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把现代企业制度引入传媒集团化的运作。传媒体制创新需要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创新。突破传媒产品纯政治属性的传统观念,认识传媒产品的商品属性,以及把传媒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新观点,对于传媒经济的

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注释:

①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 1 卷,190~19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②③④周鸿铎:《传媒产业经营与实务》,序言中的 3、4、5 页;正文中的 27、28、33 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⑤罗卓群:《新闻编辑中署名权问题的思考》,载《大众传媒》,2004(1)。

⑥胥亚:《论新闻媒介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载《大众传媒》,2002(1)。

⑦吴飞:《大众传媒经济学》,139~145 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湖南大众传媒学院 长沙 410100
湖南大学 长沙 410079)
(责任编辑:N)